

# 李叔同的填词艺术

## 汇上张氏

■ 陆起荣

■ 张俊

李叔同歌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大部分为依声而制的填词作品,表现了他对我国古典歌曲填词传统的承袭和发展。

歌曲是由歌词与曲调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在创作中,由于词与曲的结合有先后之分与主从之别,所以在词与曲的结合方式上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先词后曲,依词谱曲;另一是先曲后词,按曲填词。从我国古典歌曲发展的历史来看,据有的学者考证,除了上古时期的“古歌”是“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王灼)的先词后乐,以乐从词而外,自汉代乐府诗开始,经过隋唐五代词、宋词、元曲,直至明清的弹词、鼓曲、弋阳腔等,几乎均为先曲后词、按曲填词之作。可见,填词是我国古典歌词创作的主要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李叔同的创作活动正值清末民初的古代与近现代交接之际,所以,他承袭这个传统自是理所当然的。

同古典歌曲的多样化填词方式一样,李叔同在填词方面也运用了多种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为词配曲,如为诗经《葛藟》《黄鸟》《无衣》,楚辞《山鬼》,李白诗《行路难》,李商隐诗《隋宫》及辛弃疾的《菩萨蛮》配曲调的歌曲;二是选曲配词,如为欧阳修词《阮郎归·春景》、岑参诗《送出师西征》、杜牧诗《秋夕》、李白诗《清平调》、温庭筠诗《利州南渡》等选曲相配的歌曲;三是为曲填词,如《送别》等歌曲。在三种方式中,李叔同最为着力,也是运用最多的是为曲填词的方式。他先是为民间乐曲填词,如为《老六板》填写的《祖国歌》。东渡日本后,由于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对曲调的选择即倏地转而弃中就西了,尤其是他中期创作的“别体唱歌”的歌词,绝大部分是为意、德、法、英、美等欧美国家的歌曲曲调填词的歌曲。这些歌曲,其所填之词与所依之曲,无论在感情基调上,还是在语调、字调的处理上,都达到了严丝合缝完美和谐的传统。抒写火热爱国情怀的《大中华》,是为意大利作曲家贝尼尼的歌剧《诺尔玛》中著名大进行曲填词的歌曲。日本明治时期曾有以此曲调填词的《祝福》歌,估计李叔同是按照此歌中大进行曲的曲调填词的。《诺尔玛》被称为一部英雄歌剧,在女主人公诺尔玛率高卢人进入罗马人的前夕,雄壮的合唱引出了一曲管弦乐演奏的极有气势的大进行曲,李叔同从这种英雄豪迈的气势中找到了《大中华》与大进行曲共同的感情基调,并依循着大进行曲大调式的带符点上行的起始乐句,填写了充满自豪的赞颂诗句:“万岁!万岁!万岁!赤县高瞻神明裔。”《春郊赛跑》一词是按照德国著名儿童歌曲作曲家赫林的《木马》一歌的曲调填写的。该歌曲的第二段歌词是这样的:“跑,跑,跑!别把我摔倒!如果你要把我摔倒,一阵鞭子,只多不少。别把我摔倒!跑,跑,跑,跑,跑!”(钱仁康译)李叔同的填词,在内容上不仅和木马跑有联系,在语句上,也是步着曲调一音一字填写的,因此,无论是词情还是语句,都与曲调达到了十分贴切的地步。《采莲》一词是根据德国的一首民歌《花开》的曲调填写的。李叔同准确地把握了该曲调轻盈欢快的情绪特点,一字一音地填写了富有乐府民歌风格的诗句,令人如亲临那诗情画意的劳动情景,听到了采莲人的欢声笑语。《哀祖国》一词是按照法国国歌《月光》的曲调填写的。原曲调是一首母亲唱给孩子的摇篮曲,四个乐句的曲调有三句是重复的,看来简单平易,但听起来却真挚深沉,它与李叔同对祖国的深切哀痛是合情合拍的。《秋夜》一词则是为爱尔兰民歌《相信我》的曲调填写的。这是一首向爱人倾诉忠贞不渝的衷情的情歌,歌中婉转起伏跌宕的爱的情潮,正是李叔同对那个令人爽心开明的美好秋夜的一腔痴情的真实写照。《梦》一词是按照美国著名作曲家福斯特的《故乡亲人》一歌的曲调填写的。流落在外地的福斯特通过该歌曲抒发了自己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寂与惆怅,并借此寄托了深长的思念之情,歌曲的旋律富有浓郁的赞美歌的风格。李叔同则借此词抒写了自己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深切怀念之情,歌词乘着曲调飞扬起来的歌声,深深触动着人们爱的心弦。至于《爱》《化身》《男儿》和《人与自然》等表现爱、弘法和赞美自然等主题的诸词,李叔同皆选择了基督教赞美诗的歌调为其填写,可以想见,词与曲的风格还是较为贴近的。

在李叔同填写的诸多歌词中,最为国人称道的,也是



李叔同及其《音乐小杂志》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送别》了,我们不妨通过对这首歌词的重点赏析,来集中展现一下李叔同在填词方面的非凡造诣。

为曲填词,先要把握曲,其一先要把握曲的感情基调。作为音乐的曲是直接以其乐音表达感情的,只有把握了其所表达的感情基调,才能为其所填之词确立起与之相符合的感情基调。其二主要把曲的听觉形象的情绪化作视觉形象的场面,以营造文学形象。音乐所表达的或喜或悲的感情基调是确定的,然而由对此情绪的体验中所联想出来的生活画面却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填词者必然按照自己对总体的独特感受,通过丰富的想象,构建出与音乐形象相匹配的生活画面来,以使视觉的歌词形象与听觉的音乐形象相吻合。其三要使所填之词的文学语言在风格、结构、表述乃至语势、字调诸方面与所倚之曲的音乐语言在总体上保持一致。就《送别》来说,这首歌曲的原曲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奥德威作词作曲的《梦见家和母亲》,其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梦中的家最温馨,回想起童年和母亲;每当我夜里一觉醒,总是梦见了家和母亲。”(钱仁康译)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词作家大童球儿以溪管采用此歌的曲调,填写了《旅愁》的新词:“西风起,秋深深,秋空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忆故土,思故人,高堂念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归梦新。”(钱仁康译)李叔同的《送别》就是根据当时在日本很流行的《旅愁》所倚的曲调填写的。原曲旋律流畅婉转,节奏平缓,抒发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其情绪基调同样是忧伤的。《旅愁》抒写的是游子的惆怅之情,其情绪基调是忧伤的。原曲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的是三部曲式:第一乐段是较为平和的叙述;第二乐段则变为较为激动的倾诉,与第一乐段形成对比;第三乐段是第一乐段的再现,是全曲的一次大的重复。其每个乐段又都是由上下两个乐句所组成,而每个乐句的第二乐句也即结构皆相同,从而造成了曲中三次大的重复。大小重复的运用形成了旋律上回环往复的特点,恰切地表现了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悱恻的惆怅情绪,连续不断地扣击人心。李叔同心领该曲的灵犀,神会该曲的情致,他首先准确地把握了其忧伤的基本情调,为自己的填词确立了基本立意:抒写别情。为形象地表现这一由听觉传达出来的情绪特点,他通过自己的想象,构思了一个与该情绪相符的视觉形象场景,即送别的场面,从而大体上完成了从

唯声的音乐形象到表意的文学形象的情合理顺的转化。其次,他又凭借自己对词曲契合之道的深谙,将歌词文学语言的表述与曲调音乐语言的表达最大限度地妙合在一起。针对原曲三段体的结构特点,他为所填之词相应地设计了写景——抒情——写景的三个语言表述层次。具体地说,先为第一乐段填上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写景段落,刻画了一幅送别的场景,营造了一个令人感伤的环境氛围。随即在第二乐段填上了“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的抒情段落,用直接抒情的方式将强烈而又鲜明的所感之情推向了高潮,令人为之肠断。最后,又在再现的第三乐段重复第一乐段的写景段落,将无限感伤的情绪融入由长亭、古道、晚风、残笛、夕阳等意象组合而成的苍凉寂寞的景色里,使天地万物都笼罩在浓郁的忧伤之中。此外,在原曲调中的三次小重复处,李叔同又特意将“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两个景句作了一头一尾的两次重复,不仅强化了凄凄惨惨的离愁别绪的抒发,还在全词的结尾处给人们留下了“人间重晚晴”的深长意味。《送别》词的这种以景起,以景结,即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抒情方式,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传统的抒情特点,它不但使该词具有了幽深的意境,也释放出了淳厚的中国味儿。而将如此中国味道十足的歌词填入美国风味的曲调,令人听来,非但感觉不出杂沓味,反倒感到确是地道的中国歌,这就是李叔同填词功夫的令人叫绝之处。

为曲填词,既须通词,也须晓曲,还须通晓使词曲完美结合为一首全新的歌曲的门道。在当时的乐歌作者中,李叔同几乎是唯一的一位既通诗词、又晓音乐的才女与乐才兼备的艺术家。正因如此,他为曲填词的歌词作品达到了当时乐歌的最高水平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还应指出,李叔同既承袭了我国填词艺术的传统,又不囿于传统而对其作了新的发展。他大部分的歌词均是依照西洋曲调填写的,随着音乐的改变,势必要求歌词的革新,因此,他必须而且也确实率先打破了旧音律对歌词的许多不合理的束缚,使歌词这一文体在反映新的时代、抒写新的情志方面出现了许多质的新变,这无疑对我国现代歌词的兴起和逐渐走向成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注:作者系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歌词月报》主编)

# 盛唐时期山水田园派诗人丘为

■ 郭杰光

一书中称——

读丘为诗,如坐春风中,令人心旷神怡。其人与摩诘(即王维)友,诗亦相近,且终卷和平淡荡,无叫号噪之音。实为确评。

丘为与山水诗人王维为同时代人,他们交谊甚深。据元代辛文房所编撰的《唐才子传》记载:“王维甚称许之(指丘为),常与唱和。”此外,与王维的交往也可由以下这几首诗为证,如丘为的《湖中寄王侍御》,其中“每有南浦信,仍期后月游”,这两句直接抒发作者每次收到对方的信后便渴望与友人的再次重逢之情,而通读整首诗,更能明显地感受到两人间的深厚交往所言非虚。此外还如《留别王维》——

归鞍白月外,缭绕出前山。  
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闲。  
余骑簪组送,欲趁落花还。  
一步一回首,迟迟向近关。

虽然这首诗有学者认为是王维写给丘为的《留别丘为》,但不管怎样,从诗句本身入手,我们可以感知两人间的交往及深厚情谊。另外,王维也为丘为写过一些送别的诗以表达二者之间真挚的友谊,例如《送丘为落第归江东》、《送丘为往唐州》等。

作为一个江南诗人,丘为的诗歌受吴越山水诗的影响很深,在诗歌创作时遵循吴越山水诗从旧景中见新情的创作路数:以吴越山水为题材,从平时日常生活所见中取景,诗歌语言口语化,同时和声律相结合,具有明白易懂、浅近流畅的特点,诗风清幽平淡,正如明末学者唐汝询《唐诗解》所评:“丘为,苏人,未免染吴音,然亦清情不凡。”如他的颇具江南农家风味的《泛若耶溪》——

结庐若耶里,左右若耶水。  
无日不钓鱼,有时向城市。  
溪中水流急,渡口水流宽。  
父母闲渔舍,往来殊不难。  
一川草长绿,四时那得辨。  
短褐衣妻子,绡粮及鸡犬。

日暮鸟雀稀,稚子呼牛归。

住处无邻里,柴门独掩扉。

若耶溪今名平水江,是绍兴境内一条著名的溪流,历代有许多文人墨客写诗赞美,但大多数人在此泛舟时只注意到了此地的山水之美,而丘为的诗使山水、田园两大题材的表现和意趣融为一体。诗人用独特的角度,将若耶溪两岸青草常绿的优美自然环境和陶渊明诗中的田园风味结合起来,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近水田家的生活图景:隐者在若耶山里构筑了房舍,若耶溪从房屋两边流过。长于河边的青草四季常绿,隐者平日钓鱼、砍柴,由穿着粗布短衣的妻子、孩子相陪,用多余的粮食喂鸡犬,日暮时鸟雀归林,尚年幼的儿子呼牛归家。整首诗的描写正如明代文学家钟惺、谭元春在《唐诗归》一书所评“说来只是清幽,全不萧条”、“说得透逸而不闲散”,别具一番风味。又如《寻西山隐者不遇》一诗——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扣关无僮仆,窈窕唯寒几。  
若非巾柴车,应是秋秋水。  
差池不相见,奄奄空仰止。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  
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  
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这首五言古诗是他早期的作品,大约写于其中进士之前。如题所示,诗人是专程到山中寻访隐者,结果却未见到。但看到居住环境,有感而发,便写了这首诗。诗的前八句为第一层意思,写访友不遇。后八句为第二层意思,写不遇中又有得:从山间清新幽绝之景中,寻得幽情雅趣。前二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写景,为抒情作铺垫。“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这四句是全诗的主旨所在。我们读到这里,不仅一位志趣高雅的隐者形象浮现于眼前,而且似乎也看到了一位与隐者同调的高士。因此,这首诗与其说是访隐者,不如说是寻幽趣,从中也可探寻到诗人的志趣所在。

丘为,生卒年和字号均不详。苏州嘉兴县人,其故居后称丘为里,现属平湖市钟埭街道。其生平主要记载于《新唐书·文艺志四》,但十分简略,原文为:“《丘为集》,亡。苏州嘉兴人,事继母孝,尝有灵芝生于室。累官太子右庶子,时年八十,而母无恙,给俸禄之半。及居忧,观察使韩滉以致仕官给禄所以惠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唯罢春秋羊酒。初还乡,县令谒之,为侯门馨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经县署,降马而趋。卒年九十六。”另外,《唐才子传》、《唐诗汇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唐诗大辞典》(修订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有限的文字记载,从中可得到他的一个简要的生平。丘为的生母早逝,但他对继母十分孝顺。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便回家苦读数年,终于在天宝二年(743)考中进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贞元四年(788),以左散骑常侍致仕,当时丘为已年逾八十,由于其继母尚在,朝廷十分优待,便给予一半俸禄,让他用来奉养老人。丘为的继母病逝后,有官员提出应停止丘为享有的一半俸禄。但时任观察使的韩滉认为,给致仕官俸禄,目的是惠养老臣,不能因为丘为的母亲病逝而停止,只应减去春秋两季朝廷赐给的羊、酒。丘为为人十分谦恭,举止有礼。他刚致仕回乡时,有一次嘉兴县令来拜访,便弯腰守候在门口。等县令进门坐下后,丘为便恭恭敬敬地行拜礼,等陪同的里长出后,才坐了下来。有时骑马经过县衙门时,立即下马,等过了县衙后再上马骑行。终年九十六岁,是唐代享年最高的诗人。

丘为有诗文集传世,后散佚。至今存世的诗歌有18首,其中《全唐诗》存诗13首,《全唐诗外编》补诗5首。陈伯海《唐诗汇评》称丘为“为诗长于五言”,在存世的18首诗歌中五言诗占13首,其中除《渡汉江》疑为戴叔伦的《江行》、《留别王维》疑为王维的《留别丘为》、《省试夏日观雨》疑为张籍所作外,传世有《寻西山隐者不遇》、《题农父庐舍》、《泛若耶溪》等五言诗10首。他的诗格调清幽淡逸,多写田园风物,文学史上将他列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作者之一。明末清初文学家贺贻孙《载酒园诗话又编》

汇上位于现当湖街道南河头社区永凝桥东堍北侧约30米处的官弄浜(古称“清水浜”)北,西侧沿河往北到邢家廊下,因旧时称刘家汇(已填),故名汇上。1987年建人民西路后,汇上被阻断,1997年汇上老屋被拆除。因张氏家族世居于此,且为名门望族,故又被人称为“汇上张家”。

张氏先祖为南宋宰相、四川绵竹籍的抗金英雄张浚。据《张氏家乘》记载,其六世孙张溥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曾任淮扬节度使判官,初居苏州,元兵南渡时,避乱来平湖,隐居芦川,“平湖始有张也”。由于张氏家族治家有方,通过治水肥田,家产由初时的100亩增至数千亩。但因东乡地方多盗,治安不良,张氏二十一世孙友德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从东乡葭蓼围(今为周圩)迁居清水浜(汇上)。

清代中叶以前,平湖地方名门望族众多,而当时张氏家族声望并不显赫。家族中没有中过举人、进士,科举方面以下层为多,但张氏家族以诗礼传家,耕读为重,隐居乡间,家风淳朴。其家族后代大都正直厚道,乐善好施,勤奋好学,表率乡里,在当地传为佳话。张氏十九世孙冲元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运送货物至芜湖,对方多付了300两银子,冲元回家发觉后,专门驾船去芜湖归还。

二十二世孙永年(1697—1776),字丹九,大学生。平生爱好围棋,其子世昌、世仁皆能文工弈,父子三人有“柘湖三张”之称。乾隆四年(1739),张永年慕名邀请围棋国手范西屏、施襄夏到平湖以棋会友,在张宅对局。当年范31岁、施30岁,正当棋艺巅峰时期。范、施应主人的请求,进行围棋对抗比赛,双方共对弈13局,现存棋谱11局,这就是“当湖十局”的由来。“当湖十局”代表了当时围棋界的最高水准,也是两位大师留于后世的唯一对局记录,至今仍被我国围棋界奉为古棋谱之典范。后张永年与世昌、世仁两子将范、施授予谱选录二十八局,辑为《三张弈谱》行世。然而“当湖十局”并未收录于《三张弈谱》内,甚至序文也未曾道及,令人不免奇怪。直到同治年间,永年玄孙张金折有《坐隐居谈弈理诗刊七古》一篇,才提到此事。诗刊中有云——

乾隆之季施范鸣,条理始终集大成。  
地灵人杰主宗盟,神乎技矣四筵尺。  
瞬息万变斗机巧,疾逾鹰眼健鹰爪。  
以征解任洵州观,借助酸馐谁分晓。  
三江两浙数十局,大开旗鼓东南晓。  
当湖客舍十三局,旁观当作传灯录。  
念我先人雅好棋,棋中授受见而知。  
诗中叙述渊源,出自家乘,当可作为信史。由此可知,范、施两雄确在当湖对弈13局。

张氏后裔数百年来以砚为田,诗书传家。世昌长子张诒(1747—1806),字士周,号耕洲,清乾隆年间监生。此人自幼聪颖,才华横溢,工诗善文,学识渊博,曾在清水浜筑“耕洲山庄”。山庄内建有“土周书堂”,与当时的“山村书堆”齐名。他气节高尚、为人慷慨,与人交往没有城府,他人若有过失,敢于当面指正,故被敬称为长者。清光绪《平湖县志》记载曰:当时,知县暴政于民,张诒与同乡八人一起上书省府举报;知县闻之恐惧,赠以金钱,张诒拒受。上司问张诒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张诒答曰:“诒非为己,欲使一邑士民皆及于宽政。”张诒作诗字斟酌、句句推敲,一丝不苟,著有《耕洲诗钞》9卷、《张氏家乘》10卷等诗文集,皆传于后世。他的诗作曾获得大才子袁枚(杭州人,清乾隆进士)的赞赏。

张氏家族于清代康乾以后,家道隆兴,产业倍增,是平湖历史上修谱次数最多的家族之一。张氏南支于嘉庆年间修谱时,出进士2人、举人11人。张诒弟张颢(1749—1815),字希和,号熙河,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专心于性理之学,力求济世之道。平生好义举,首捐千金,与兄弟及同乡五人,倡修文庙,在泖河乡村建立同善会,掩埋尸骨16000多具。

张氏兄弟几人同居共财,爱好旅游,东登泰山,西涉峨眉,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为怀念先祖张浚,张颢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聘请工匠,采乍浦九山之石,仿照峨眉山“一线天”等二十四处景色,叠石成山,于嘉庆十九年(1814)竣工,历时22年之久。小园建成后,张颢认为近郊唯鞍山一处,但皆土无石,此山小巧玲珑犹如婴儿,取名为“嬰山”。嬰山占地仅3分8厘,合253平方米,周长仅40余步,高4丈7尺,高出平湖城墙1丈余,为当年城内最高的景观,与乍浦九峰遥遥相对。登上嬰山顶,可以遥望全城美景。《嬰山志》云:“遥对海上诸峰,岩峦壑洞石之奇甲我邑。”嬰山小园也成为平湖城内唯一的以山命名的景观,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

张颢之后,张氏一族依然名人辈出。二十六世孙张金鏞(1805—1860),字良甫,号海门。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咸丰年间,曾任乡试同考官、实录馆纂修、乡试正考官、湖南学政、翰林院侍讲。晚年,潜心研究诗词,造诣颇深。喜画梅,兼善分、隶。著有《躬厚堂诗文集》《绛跣山馆词》等。

二十九世孙张堂坤(1903—1927),幼时就学于私塾,后转入笔者祖父陆润章创办的宏鲁小学。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二期工科,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东征,1926年编入叶挺的独立团,任第二营第四连连长。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10月1日,部队在进军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时,遭到广东军阀的进攻。张代理第十一军七十五团团长,担任前沿阵地指挥,10月4日被捕,次日被杀害。

还有我国茶学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张堂恒(1917—1996),193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经济系。1947年9月,考取教育部留美研究生。解放后,学成归国,先后任职于武汉大学农学院、浙江省农业厅特产局、浙江农业大学。1987年被评为茶学学科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茶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他开创性地提出“茶叶鲜汁”加工,为茶树鲜叶多种利用开创了途径。出版有《张堂恒选集》等。